

驾驭 市场

政府、市场与体制创新丛书

企业管理出版社

〔美〕罗伯特·韦德著 吕行建等译 沈泽芬校



中财 B0004346

政府、市场与体制创新丛书

驾驭市场

——经济理论和东亚工业化
中政府的作用

[美] 罗伯特·韦德 著

Governing the Market

——Economic Theory and the
Role of Government in
East Asian Industrialization
Robert Wade

吕行建 吕向阳 吴湘纓 译
李配娟 何毓津 郑须弥

沈 泽

中央财经大学图书馆藏书

总号 429053

书号 7110/15

企业管理出版社

(京)新登字 052 号

- © 1990, 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
- © 1994 年, 中文简体字版专有出版权属企业管理出版社。本书经博达著作权代理有限公司安排, 取得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正式授权出版。有关版权业务的咨询, 请联系博达著作权代理有限公司。

驾驭市场

〔美〕罗伯特·韦德 著

吕行建等 译 沈泽芬 校

企业管理出版社出版

(社址: 北京市海淀区紫竹院南路 17 号 100044)

☆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邮电学院印刷厂印刷

☆

850×1168 毫米 32 开 13.5 印张 351 千字

1994 年 5 月第 1 版 1994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5000 册

定价: 12.00 元

ISBN7-80001-380-4/F·380

政府、市场与体制创新丛书

名誉顾问：

袁宝华 孙尚清

顾 问：

马 凯	王岐山	王小强	邓英淘
李剑阁	陈文鸿	周小川	范之元
和 铭	姜 洪	秦 晓	楼继伟

主 编：

李克穆

丛书编辑部：

黄 晋 王宝菊 李亚男 郑勇利

序

中国的改革开放事业已经展开了15年。自1978年以来在占世界人口近四分之一的中国,作为世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取得了持续15年的高速发展。今天在世界经济持续萧条的情况下,中国改革开放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得到了广泛的承认。

过去15年的改革,在一定意义上说,是以开放和搞活为主要特点。针对僵化的传统计划体制,破除迷信,解放思想,总结经验,大胆引进市场机制,引进国外先进的技术和管理是改革的主要成功之处。近两年,制定全民所有制企业转换经营机制条例、股份制管理条例、建立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进行金融财税和投资体制改革等一系列新的举措,标志着中国改革进入了一个更深入的阶段,一个由破到立,由引进市场机制到建立市场秩序,由减少政府干预到重新构造政府管理职能的新的阶段。

为了适应这一新阶段的历史要求,一批中青年决心编纂一套丛书,取名为“政府、市场与体制创新”,翻译和介绍有关经济体制建设方面的历史经验和学术探讨。丛书的名字和出发点都反映了这个时代的需要。这批中青年同志曾经从不同的角度深入地参与了15年的改革,脚踏实地地作了不少工作。祝愿这套丛书也能扎扎实实地办好,在中国真正大有希望、大有作为的历史时刻,发挥出这套丛书的创办者们所预期的作用。

袁宝华

一九九三年九月

经济理论和政府在东亚工业化 进程里的角色

——《驾驭市场》介评

有人估计,1991年台湾的实际人均国民收入已超过英国。由大量出口异向型企业组成的竞争激烈的市场,与国际市场价格几乎完全沟通的自由价格制度,著名的外贸自由体制改革,这诸多要素使台湾成为自由市场制度成功的典范。

罗伯特·韦德著《驾驭市场——经济理论和东亚工业化中政府的作用》一书,提出完全相反的观察。作者提出,如果说明“官商一体化”的体制是政府追随市场的结果(followship role),台湾当局则始终是市场的领导者(leaderghip role)。基于台湾经济的发展过程,通过与日本、南朝鲜和香港经验的比较,围绕政府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这一主题,这部长达400多页的实证性著作向占主流地位的新古典经济学提出正面的挑战。1990年该书由普林斯顿大学出版,旋即在西方各大学,不仅成为研究东亚,而且成为研究发展问题的必读书。

新古典经济学的宗旨是国家对市场的干预越少越好。在分析东亚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NIC")的经济发展时(包括日本),新古典经济学持有两种理论解释。其一是“自由市场理论”(Free Market theory):是说"NIC"之所以成功,恰是由于"NIC"最少国家干预,最少价格和外贸外汇管制,最大限度地发挥了私有经济和自由市场的作用。其二是“模拟市场理论”(Simulated Freemarket theory):是说由于后进国家和地区市场发育程度不像典型发达国家那般完备,政府鼓励出口,提供信息,加速技术进步等一系列政策措施恰是弥补了市场发育不周全的缺陷。换言之,本来自由市场能自动解决的问题,由于市场发育不周全,而由政府模拟市场来完成了。政府模拟得越逼真,越像自由市场,经济发展越快。这两种理论实际上持有一个共同的信念:市场的自动调节功能是完美的。政府要么少去多管闲事;要管,也一定是要按市场的运行规则去弥补市场未能充分发育的缺陷。

言下之意,倘若等市场长成了,政府干预还是越少越好。

罗伯特·韦德属于另一种较新的流派——驾驭市场理论(Governing Market theory)。这种理论认为“NIC”的成功主要是由于政府不仅外在地管理市场;而且政府官僚机器自己就致身于市场运作之中,作为市场中的一个枢纽,一个不可或缺的要害,参予、组织并最终驾驭市场的运行。

《驾驭市场》这本书的突出贡献是通过大量分析指出政府驾驭市场主要不是在产品市场层次上,而是在投资层次上展开的。在产品层面上与其他一般发展中国家比较,台湾对价格、进出口、汇率等方面的管制都是很少的。因而经常被新古典经济学以及世界银行这样的机构誉为贯彻自由市场制度的典范。然而,在对生产要素的组织上,政府则给终发挥着组织者的角色。银行一直由当局直接经营,就是一个最好的例证。尽管 80 年代末允许民间进金融领域经营,但当局在金融领域的主导地位仍是毋庸置疑的。为说明政府在要素组织中的作用,对投资结构的分析可以说是全书展开的一条主要的线索。“驾驭市场”可以说是政府对市场的一系列干预(外资管理等)。组织(直接出面组织私人投资)、参与(国营企业直接经营等)主要不是控制产品的构成和流向,而是驾驭投资结构的改变,驾驭资本(包括外资)的组成和流向。

该书另一个突出的特点是强调了政治制度与这种政府“驾驭市场”功能之间的特殊关系。在展开的六个专题章节里,有三章是分析政府、体制和市场关系的。这在方法上显然优于一般新古典经济学的纯经济分析。社会生活中,任何个别利益集团的利益(包括个别产业的发展)都不能完全体现提高国家整体经济水平的整体利益。东亚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的经济起飞,都发生在相对集权的体制下。在这种体制下,各种利益集团的利益要求被相对压抑,实际的利益分化也不可能像西方国家那么顺利。因而这些国家和地区的贫富差距与西方资本主义在同样富裕水平上一直都是很低的。台湾长期保持平均 1:4 的水平,一直是资本主义国家和地区最低的。与此同时,始终不

受各种利益之争的干扰,经济主管当局可以自如地从提高整个经济国际竞争能力角度出发组合有关政策,而无须经常去迁就某一集团的特殊要求。比如:40年一贯制的军事戒严法迫使工会无法发展,结果使台湾的工资持续保持在一个极具国际竞争能力的水平上;再如土改对土地自由买卖的硬性禁止切断了中国几千年传统的土地兼并渠道,从而使资本积累最大限度地流入现代工业部门,彻底改变了社会投资结构。

由于政府的特殊作用,罗伯特·韦德用了相当的精力投入对台湾经济官僚机构和官僚队伍的研究。类似于Chalmers Johnson在《通产省和日本奇迹》(MITI and the Japanese Miracle, Stanford, 1982)一书中对日本经济官僚的精彩描述罗伯特·韦德讨论了台湾经济当局的机构、组成、功能、变迁以及官僚队伍的构成、意识形态、组织和作用。显而易见的是,对社会的责任感和对某种理论和信息的认同是维系官僚队伍工作效率的重要保证。

最后一章,根据全书的分析,作者总结性地为一般发展战略开出十个“药方”:(1)用国家政策去刺激投资,并将其引导到对长远发展最重要的产业;(2)利用一定的保护措施创建具有国际竞争能力的产业;(3)出口导向;(4)大力引进外资的同时引导外资进入出口导向产业;(5)金融系统的制度设计要便于政府控制;(6)开放外贸和金融管理制要有步骤地循序渐进;(7)在政府机构中建立“导航部门”(“Pilot Agency”)或“经济总参谋部”(“Economic general staff”)研究制定发展计划;(8)在民主化之前,建立高效政权机构;(9)在民主化之前或同时建立有关中间合作性机构;(10)通过渐进的改革促进市场发育,以支持有关工业改革的推行。

该书组织了大量实证材料,从始至终与新古典经济学的基本哲学及其对东亚新兴国家和地区经验的总结进行针锋相对的论战,没有很深的数学和模型,因而可读性很强。对台湾政治经济的分析,大量富有哲理的讨论,都颇具启发性。

舒平 1993年9月

谢 启

本书的出版导源于盖茨比慈善信托的戴维·塞恩斯伯里给萨塞克斯大学发展问题研究所的几位研究员的那笔补助金。这一款项旨在资助他们赴中国、韩国和中国台湾作实地调查,考察当地政府在经济发展方面所起作用问题。有些成果已经由麦克米伦出版公司出版,书名是《东亚的发展状况》,编辑戈登·怀特(1988年)。我感谢参与这项研究课题的发展问题研究所的同事们:杰克·格雷,理查德·勒德—纽拉思,米克·穆尔和戈登·怀特对我的许多启发和教导。

为了谨慎起见,我没有公布帮助我进行调查的许多台湾“政府官员”的名字,以及在台湾的其他一些宁愿我不作公开道谢的人们。但是我可以愉快地记下我对他们欠下的人情债:金荣·朱利叶斯·洪,汉尚·亨利·王,朱利安·奥德利,泰勒·比格斯,张菊萌,诺拉·兰薇·蒋,朱云汉,欣怀·迈克尔·肖,亨曼芬,詹姆士·克莱恩,约瑟夫·凯尔,克劳斯·洛奇,利文斯顿·麦钱特,庞千古,巴纳比·鲍威尔,希·希夫和马尼克斯·韦尔斯;还有西尼卡学院经济研究所所长保尔·K.C.刘,那里是我在1983年进行四个月实地调查的基地,以及春华经济研究院副院长于宗先,1988年我在那里呆了两个月。台湾方面没有给予任何资助。

本书大部分是在世界银行正常工作之余的节假日里写成的。我的主管人汉斯·滨斯沃杰、维诺德·托马斯和贾姆·德梅洛,对我的一些不同见解表现出明显的容忍态度,尤其是因为世界银行不承认台湾,而且在解释东亚经济成功的奥妙方面,我的看法在许多方面都与世界银行所开处方不同。

伍德罗·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在紧要关头授予我研究员职位,为此我要感谢罗纳德·莫尔斯;其后,公爵大学国际问题研究中心也

授予此职位，为此我得感谢查尔斯·伯格奎斯特。伊丽莎白·克雷福德、迈赖姆·贝利、吉斯莱恩·贝阿德和费利西塔斯·多罗特奥·戈麦斯帮助指导了手稿的修订。

我还要感谢下列各位以这种或那种方法帮助我阐明部分论点的人们：艾丽斯·阿姆斯特顿，柯林·布雷特福，特迪·布雷特，弗雷德·戴约，戴维·埃文斯，彼得·埃文斯，马丁·弗雷斯曼，艾伦·盖尔布，加里·格雷菲，基蒂·吉尔曼，朱莉·戈特，斯蒂芬·哈加德，布赖恩·欣德利，弗兰克·霍姆斯，苏珊·乔克斯，保尔·伊森曼，查默斯·约翰逊，唐·基辛，安妮·克鲁格，迪派克·拉尔，丹尼·利珀齐格，迈克尔·利普顿，阿舒卡·莫迪，埃利奥特·莫斯，埃莉诺·奥斯特龙，古斯塔夫·兰尼斯，多萝西·罗宾，杰弗里·谢泼德，汉斯·辛格，保尔·斯特里顿，弗雷克·维尼罗索，以及按字母排在最后的拉里·韦斯特法尔。特别值得提及的是曼弗雷德·比奈菲尔德，他作为一名全面洞察世界经济的创作者，使我——以及我的长途电话公司——从中受益非浅。我还曾同达德利·西尔斯和安德罗·肖恩菲尔德谈论过，对他们的惊人记忆力表示敬意。新西兰前驻日大使和驻韩国大使亨特·韦德和罗纳德·多尔，以及一些著名的日本专家，都敦促我注意世界的经济重心在向东亚转移。许多年来他们已向我指明，应如何越过社会学识的范围去跟踪大的经济问题。

最后，我要感谢经常同我进行热烈讨论的伊莫金和托马斯·韦德，他们又是最年轻的两位。

1989年11月

前 言

人们说,自然界不会发生突变。然而,战后时期东亚资本主义国家和地区却出现了自然界从未发生过的国家、地区经济等级跃升的情况。1986年,日本的人均收入从1962年的居世界第30位跃居第11位;同期,台湾从第85位跃居第38位;韩国从第99位跃居第44位。^①到21世纪初期,日本、中国、韩国和台湾等国家和地区在世界经济中所占的比重很可能与北美或欧洲国家相仿。台湾和韩国将同英国和意大利一样富裕。^②西方主要是通过贸易知道这一成就的。日本在1965年已是世界第4大制成品出口国,20年后又跃居第2位。就在这20年里,台湾从第28位上升到第10位,韩国从第35位上升到第13位。^③它们作为美国制成品的供应国,以1986年为例,日本居第1位,台湾居第4位,韩国居第5位。

这样的对美出口地位,是以某种惊人的工业成就为后盾的。对于日本,已毋庸多言,报纸上谈得太多了。而对于台湾和韩国,人们还所知不多。但是它们的成就,可能这么说,已使美国、日本和欧洲的跨国公司不再把它们的企业看作是依靠别人技术的二等伙伴,而是开始把它们看作是发展新产品的战略同盟中的平等伙伴。台湾和韩国都精通微型电路设计和生产,这是电子工业和依赖电子的工业中新技术的核心。1988年中期,一家台湾企业着手生产国际商用机器公司的PS/2型个人计算机的一种“复制品”,这是前一年引进的一种机器,比任何其它个人计算机都更难复制。一个知名的研究机构已准许

① 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世界银行图集数据。世界银行没有发表1980年后台湾的数据;1986年台湾的名次排列是用类似的方法计算出来的。见第二章。

② 克莱恩,1986年。

③ 见第二章表5。

国际商用机器公司使用它的中文的基本输入输出系统,专供亚洲人的个人计算机使用,并已同休莱特——帕卡德公司成立合资企业,开发专销亚洲市场的软件。台湾的许多半导体设计室中,有些已在特殊用途的集成电路方面接近世界领先地位。韩国的半导体工业在大容量存储芯片的工艺方面只落后于日、美先进企业9至12个月,它是世界第三大加工厂;韩国最先进的公司三星企业集团1989年与国际商用机器公司达成协议,互相交换半导体专利文件,这是国际商用机器公司第一次同日本、北美和欧洲以外的公司进行广泛的半导体专利交换。该协议标志着三星公司即将进入世界半导体工业的前列。在汽车方面,韩国可能成为继日本于60年代初进入世界汽车工业大国行列之后最大的新加入者。在电子消费品方面,它是仅次于日本的第二大录象机和微波炉生产者。台湾和韩国还在若干其它高附加价值的工业方面颇具国际竞争能力,包括钢铁业、机床业和石油化学工业。简而言之,它们可能是发展中国家中率先参加12国世界“创新者俱乐部”的国家和地区。

任何主张给国家财富理论作一解释的人,都必然会以东亚资本主义国家和地区的情况为例,来说明这些情况是如何符合这一总的理论,因为,如果经济增长速度最迅速的国家尚不能被接受,理论本身就会令人怀疑了。有些人认为,东亚经济成就必须归功于经济开放和小政府。由于国内的物价反映了实际短缺状况,而国家又坚持其职责,资源就流向最有效使用方面。同时,以有竞争能力的价格出口制成品,克服了国内市场狭小所带来的限制。出口的迅速增长反过来又形成一种经济增长的动力,这种动力之大是通过其他途径所无法取得的。相比之下,那些以国内市场为基础、采取更为内向战略的国家,一直处于停滞状态,部分原因是市场规模小,而部分原因则是,支持这一战略所需制订的各项规章制度抑制了私人企业主的积极性,使它们丧失了竞争的刺激,并把它们的剩余能量错误地引入游说、疏通以及其他非生产性的社会活动。

另外一些人认为,东亚经济之所以成功,政府的干预是一个重要

的因素。不过,这种干预仅限于促进出口和弥补市场的不足方面。在他们看来,政府干预“模拟”出一个理想的市场。他们同意持第一种态度者的看法,即东亚的经验证实了查尔斯·沃尔夫的反证有其真实性,沃尔夫说:“如果发展符合于国家目标和政策的优先考虑中占支配地位的重点,那么,成功的发展的诀窍,看来有赖于对政府干预的程度和性质加以明确的限制”(1981:91)。

上述两种就东亚成绩作出的“市场高于一切”的解释,在70年代和80年代的经济界同行中占主流地位。在他们的对立面,还有若干不同的反对意见。有的强调孔夫子的集团思想以及生活俭朴的经营勇气。有的还强调商业管理的特殊技术。但是,最流行的非正统观念强调,东亚资本主义国家和地区的政府在经济中所起的某种作用具有重大意义,它有助于走上一条把资本主义各种机构组成整体的新的、有效的道路。

提出“政府领导”论的人,阐明或者暗示政府干预——最受日本通商省和通产省的赞美——一是东亚取得成功的主要因素。更站得住脚的一种系统的论述是:政府干预乃连接公共体系和以私人为主的市场体系的协作器,各自的产出成为他人的投入,由政府制定规则并影响私人企业的决策,使之符合于政府为经济设计的恰当的工业和贸易轮廓。通过这种机制,市场的优势(如分散、竞争、多样和多种经验)便把生产者与自由市场的不稳定性部分地隔开,并刺激资金投向政府选定为有利于经济未来增长的某些工业等方面的优势结合起来。这一结合改进了自由市场的效果。

在怎样才能使穷国不太穷的一章内,问题的要害有着深远的意义。确实,对于许多国家来说,眼前的问题还不是使自己变得不太穷,而是怎样使自己不致变得更穷:1980—1986年间,2/3的中等收入国家的投资水平不断下降。^①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著名理论家是迅速增长的自由市场理论的支持者中比较热烈的一些人,他

^① 世界银行1988年,表4,国内投资总额。

们已为穷国开出了自由化和私有化的药方。英国《经济学家》作了这样的概括：“这两个机构越来越感到自己被卷入了一系列政策问题之中：怎样才能在国际气候不利情况下促使经济增长？基金组织和银行所作的回答可以概括为几个字：“把价格定得恰当”（1988年9月24日，第39页）。为了取得环境条件许可下最迅速的增长，发展中国家必须达到这一目的：使国内经济更加完全地与国际经济并为一体，并减少政府“干预”市场的程度。如果有些政府不能自愿地理解这个道理，国际机构为了这些国家的公民以及整个世界经济的最大利益而责成它们这样去做，是正当的。

如果上述药方全面地概括了台湾与韩国赖以取胜的机制，如果这一机制在世界经济状况中运行并为它们服务，而这种世界经济状况仍然存在的话，那么可以假定，台湾与韩国的成功令人信服地支持这张药方。但是，如果东亚成功的重要因素是政府操纵市场这一论点可以成立的话，那么，医治发展中国家的通病的药方便需要重新考虑了。因为，这不能说经济自由化总是好的；参加国际经济一体的合理需要性便成为一个可视地位和情况而定的问题，也就会不顾这些需要性而着重于改善现有的规划与控制部署，以及更多地依靠国内需求而不是依靠出口需求的增长。对自由化进行有理由的限制必须与所赞同的论点一样，谨慎地予以说明，并使之同一个合理化组织相适应。这不能被说成是：由于政府固有的性质，没有一个政府能比那些不受指导的、独立经营的企业主更迅速地扩大国家的财富。政府通过增加投资和优先促进某些活动等办法加速经济发展方面的能力，成了一个变数，而不是常数。

问题的要害已涉及西方国家的公民们。因为东亚一些经济繁荣的国家和地区正向他们的制造业提出竞争的威胁。当问及他们今后5年里美国制造业面临的最严重的竞争威胁来自何方时，美国250家大企业的总经理中，有2/3的人一致认为，来自“诸如巴西、韩国和台湾等新兴国家和地区”。只有29%的人选择了日本，5%的人选择了欧洲，比率之小可不予考虑（美国《商业周刊》1987年1月12日）。

面对这一竞争,西方国家中一部分低收入或最终沦为无业的人口,他们的生活水平将有实际下降的可能性。为了思考这种有针对性的战略,首先要了解东亚国家和地区的竞争机制,这是很重要的。这一机制是否主要建立在廉价劳动力和坚持自由市场之上?或者,它是否建立在对资本主义机构的不同安排之上,由政府帮助加强重点工业的竞争能力?如果是后者的话,那么对于美国政府在确定和支持特定的工业目标方面起作用这一点抱有哲学上的反感的无效性提出了疑问。它告诫不要搞经济自由化和少搞一些国家的干预——除非我仍愿意遵循固德异公司副董事长的忠告,以此作为发达国家回报的中心一击,他说,“在我们把实际工资水平下降到接近巴西和韩国的水平之前,我们不能在把生产率的收益转化为工资的同时仍具有竞争能力”(多伦多《全球邮报》1987年6月19日)。

台湾是经济发展记录中最成功的事例之一。在不到四分之一世纪的时间里,它已成为一个重要的贸易和工业化地区。它已经开始显露出那些迈向经济等级的最高层的国家和地区才具有的双重特点:资本输出寻找廉价劳动力以及非法外国劳动力的流入,寻求较高的工资。本书主要论述台湾经济的机构、结构和运作。有关“台湾奇迹”的著作大多把它描述为近乎自由市场的产物。我将论证说,政府的作用这一点已大大超越了英美经济的实践和新古典主义学派经济的原理,与此同时,资源的配置也已首先通过强有力地起作用的市场而出现。我还将表明,这同样适用于韩国和日本。这三个国家、地区有共同之处,政府在增加本国本地区内工业的国际竞争能力从而最终提高生活水平方面都负有强烈的、相当明确的义务。这一义务导致他们制定了类似的控制市场的政策和组织。他们的杰出经济成就使人们有理由认为,他们已创造了一种更具竞争力的资本主义形式,其他国家学习他们的经验可能是明智的。

本书是为那些有兴趣利用公共的力量来促进经济增长和提高大众的生活水平的国家写的。有关日本的参考书大多是1973年以前出版的。

目 录

第一章	国家、市场和工业政策	(1)
第二章	东亚的崛起	(31)
第三章	新古典学派的解释	(52)
第四章	台湾的工业化	(77)
第五章	外贸和外资的管理	(122)
第六章	台内投资的管理	(173)
第七章	经济的官僚体制	(212)
第八章	政治制度	(249)
第九章	投资战略与工业政策	(270)
第十章	结论:(1)有管理的东亚市场	(314)
第十一章	结论:(2)东亚的经验教训	(369)

第一章

国家、市场和工业政策

国家的经济作用问题在两个世纪以来一直吸引着学者的注意力，然而却没有激起他们的好奇心……经验主义者论证国家的经济权能的主要手段一直限于谈论轶事。

—乔治·施蒂格勒

在 50 年代和 60 年代，经济政策上占支配地位的做法是国家^①在弥补市场的不足方面起实质性的作用。在工业国家里，大萧条和战时的国家财政计划与控制^②的经历提供了这种推动力。一些同“不发达国家”有交往的经济学家也提出了这种办法，并把它作为发展经济学中新兴科学的基础。发展经济学的早期文章集中表明，不发达国家所处环境是如何的特殊——私人储蓄低、依靠初级产品的出口，出口品价格越来越低于进口品价格，内部市场狭小，熟练工人有限，企业主很少能适应大规模组织，以及普遍性的失业等，他们需要让国家的作用起得比发达国家所起的大得多。

根据发展经济学家的看法，这些环境意味着不发达国家不能期望实现充分就业，也不能期望实行开放性经济就能赚取足够的外汇、以满足无节制的需求。它们即不顾汇率的升降，而工资又只够糊口的水平，生产可在国际市场上销售的货物和劳务等活动，留下的只是短缺。依靠自由市场就会使两重性结合而不同化，或资本主义前的与资

① 我用“政府”一词意指执行机构，而这里的“国家”(State)一词，是指政府机构形成的更广泛的结构，但在实际生活中，这两个词经常是可以交替使用的一对。台湾和韩国来说，这种混用不象其他许多国家看得那么认真。

② 政府财政计划与控制(Dirigism)一词在法文中含有由政府掌握的方向性推力或定向力量的意思(法文《拉罗斯小辞典》，1975 年版)。我使用该词时，指导下的市场和有控制的市场多少是可交替使用的，意即施以强大的影响而不是控制得很紧。